

学者观点

增加古诗文篇目，练好优秀传统文化“童子功”

■李定广

古诗文是语文学“三怕”之一？畏惧不能成为逃避的理由！

教育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的教育能直接看出这个国家国民的素质与文化底蘊，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未来的发展。语文教育在中小学各学科教育中又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我认为语文教育应当根植于古诗文。

首先，重视古诗文教育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区别于他国文化的重要立足点，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民族之根，必须落实在中小学教育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内涵丰富，包含文、史、哲、艺术、宗教等等，但古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精华部分，可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因此，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特别重视古诗文教育。

“五四”以来，由于民族自卑感的增加而导致弱化甚至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就弱化甚至否定古

诗文教育。数十年时间内，中小学语文课本里古诗文所占比例始终在20%以下，几乎剥夺了几代人应有的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权利，而今国家将初高中语文课本里古诗文所占比例增加到所有选篇的50%以上，小学语文课本古诗文比例增加到所有选篇的30%，回到它本应有的比例，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补课”。而这一“补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从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掀起全民诗词狂热的现象可见一斑。

其次，重视古诗文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曾经有学生告诉老师说对于语文有“三怕”：“一怕周树人，二怕写作文，三怕文言文。”老师听后哑然失笑，这三者确实应该“怕一怕”，但是这种心理上的畏惧不能成为逃避的借口，正是它们的

“难”才能让我们有所收获。这还只是“害怕”的情绪，有的学生对于古诗文，直接是否定与不屑的态度，他们经常会理直气壮地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早就不用文言文了，也不用创作诗歌，为什么还要学这么难的东西？”这类学生对古诗文的抱怨不仅来自学业的压力，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乃至于教育中充斥的实用主义短视观念。

这次新课标大幅增加古诗文，往小了说，是增强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往大了说，有利于削弱当今浮躁社会中粗糙的实用主义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让学生们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感受先人的高雅、智慧、情操与风趣，学会观照自己的内心，用心去触摸先贤的风骨。这样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不只是单纯的知识浇灌，更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再次，重视古诗文教育是语

文教育的本质要求。我国的语文教育，自古以来，主要就是古诗文教育。即使在当代，全世界也公认：中国最经典、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作品，大多是古诗文。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儒家对诗歌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诗可以抒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和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怨刺，可以有益于家国，可以认识自然世界。从圣贤的视角看，古诗文是有“大用”的。但是，如果从现代某些人的实用主

义角度看，古诗文未免有些“无用”，因为它似乎难以在当今高效率的社会中快速结出其应有的“果”。简单地用“有用”与“无用”来判断万事万物未免太过粗暴和短视，你觉得它眼前“无用”，又怎知它将来“有用”？你觉得它看似“无用”，实际上却有“大用”。语文教育不只是工具教育，更是思想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审美教育，而古诗文的“大用”或优势正体现在这些方面，这才是语文教育的本质。

古诗文对于白话文的特殊优势，决定了语文教育必须根植于此

由于古代书面语与口头语是两套系统，造成了文言文与古代白话文之间的二水分流，而古诗词则介于文言文与古代白话文之间，现代白话文则是继承了古代白话文并有些微发展。值得骄傲的是，汉字表意的优越性让我们至今还能读懂千百年前的文言文，更不用说古诗词了。在21世纪的今天，沧海桑田之后，我们竟然还能触摸千年前先人的文字，读懂他们的情志，这是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做不到，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古诗文对于白话文的特殊优势，首先表现在古诗文更加言简意赅，其次是古诗文承载着中国绝大部分经典，再次是古诗文更加精美，最后是学好古诗文对于我们表达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效果。可以这样说，凡是古诗文好的人，白话文水平一定高，表达能力一定强，反之则不然。古诗文对于白话文的这些优势决定了语文教育必须根植于古诗文。

因为“童子功”对于学好古诗文

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中小学阶段必须加强古诗文学习。所谓“童子功”阶段指小学到高中，这一时期是孩子们人生记忆力的高峰期，背熟的古诗文将会终身难忘。

当然，对于古诗文背诵，有人怀疑它的用处或意义，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千百年的教育都是从背诵开始，回看我们曾经的灿烂文化吗？更别说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了。当然，如果在老师的指导下科学地背诵学习，更要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的老师提出要求了。对于老师来说，他们首先要喜爱、理解、尊重古诗文，不能带着仅仅为了完成教学任务的敷衍态度；其次要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修养；再次需要研究学习背诵古诗文的方法，研究不同阶段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差异，激发学生对于古诗文的兴趣。老师是学生精神上的领路人，如果带着学生局限于背诵默写的框框里，未免把大事做小了。

至于语文课本大幅增加古诗文“会不会增加学生学业负担”的疑问，教育部官方的两点回应很精彩：什么是负担？每个人，无论是学习、工作，肯定要干事，如果说花了很多精力、很多功夫干这个事，对个人的成长、对社会没有太多的意义，没有太多的价值，这就是负担；如果孩子每天忙的方式和成长关联贡献不是那么大，比如天天做题，对他提高他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没有帮助，就是负担。所以我们减负要减这些负担，不是简单地谈减负就是少学习、不学习。此外，古诗词本身的美感就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学生吟诵古诗词会觉得兴趣无穷，不会感到这是负担，近年的全民诗词热已能说明问题。

总之，我们感动于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落实，应该为语文教育根植于古诗文喝彩！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



培养“吸收性思维”应对产业快速迭代

■本报记者 张鹏

“如果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好计算思维。了解了游戏背后的思维运算程序，根本没必要上瘾，更不至于茶饭不思、废寝忘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成员任友群的话，为家庭教育打开了一个新思路。

当社会的车轮滚滚驶入人工智能时代，孩子们应该具备怎样的综合素质，才能在未来社会拥有一席之地？寒假伊始，2018上海国际少儿生活方式展为家长和学生呈现出一些新鲜的儿童生活方式。不少教育专家认为，未来，凭借传统课堂教学和课后刷题就能考上大学的时代或将将被颠覆。面对产业的快速迭代，孩子的成长应该具有“吸收性思维”，在拿起纸笔答题的基础上，还要拥有信息素养、动手能力以及对世界的感悟力。

父亲的幸福度远远超过母亲

在舞蹈艺术家、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黄豆豆的认知中，这世界上有一件事比跳舞还难——当好父亲。黄豆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他认为父亲更需要以理性的态度处事。“我们家里绝对是‘虎妈猫爸’，妈妈管功课，难免给

孩子压力，而我作为爸爸，就负责给孩子减压。”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做过一项针对8000个儿童家庭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其实孩子的压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说，孩子在写作业时开小差或拖延等，这些都是释放压力的表现。相比之下，反而是母亲更焦虑。“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母亲照料更多，因而她们往往更焦虑，而当父亲的幸福度是远远超过当母亲的。”

“之所以现在家庭会有这么大压力，是因为家长对孩子期望值过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一语道破了如今中国家长普遍焦虑的原因。眼下，中国大学生入学率约为40%，美国和以色列也不过50%。

葛剑雄还对“成功”的定义作了阐释。他说，成功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一是历史的机遇，二是个人的天赋，最后才是因材施教和个人的努力。”中国的家长大多对孩子抱有龙成龙的期待，其实，家长们要接受这一点：孩子成为一个普通人挺好，要学会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孩

子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发展。

刷十万道题考大学的模式将被颠覆

“眼下，课堂教学的传统模式，以及课余时间刷题刷题就能考大学的形态，也许十年后将被颠覆。”杨雄说，未来，学历证明对于寻求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低。随着产业迭代加速，每个人一生所要从事的职业数量也将逐渐增多。甚至，就知识本身存在的形态都将被打破——原本是看书获取知识，今后更多是从网络中获取信息，而知识整合的能力或许更为重要。

这一番话，得到不少专家的认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任友群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以多种方式渗透到孩子们的生活中，纸笔考试已经不能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选拔的需求，学校教育要花大力气培养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工程素养以及表达能力等。

如何培养这些能力？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STEAM）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便是途径之一。任友群说，面向大数据时代和人工智能的未来，幼儿园的孩子就可以适当参与此类课程，并同时注重人文素养的培育。“信息时代，家长既不能恐惧、放任不管，也不能约束太多。要鼓励孩子动手动脑，掌握信息技术。若真是了解了计算机背后的算法，孩子们就会发现沉迷于网络游戏是很可笑的事情。”

美国蒙特梭利学会认证委员会联合主席劳拉·洛克女士也认识到，孩子们所处的成长环境正在慢慢变化——他们出生之后就面对多元的文化，与父母沟通可以用微信，工作时可以开电话会议，随着他们的成长，世界依旧在不断变化中。在她看来，学生们更应该拥有“吸收性思维”，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从周围吸收信息，在大脑中产生印象。这些庞杂的信息糅杂在一起，孩子们应具备按照秩序分类、归纳

的能力。

家庭教育要尊重成长的规律

“家庭教育需要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陪伴，同时，对孩子的教育应该建立在配合学校教育的前提下。”黄豆豆的做法引起家长们的共鸣。一次，黄豆豆的女儿提出想看芭蕾舞演出。在黄豆豆夫妇看来，艺术绝不只是简单地买一张票，而是让孩子先了解芭蕾舞的知识，再体会其魅力，之前家庭用亲子时间做好“功课”很重要。“让孩子懂得感恩生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这是我们这代父母应该重视、更应该做的事情。”

“面向孩子的教育，既要有平常心，尊重规律，顺其自然，也要适当给予后天的干预，不是‘甩手掌柜’，也不能‘大包大揽’。”任友群说，多数大城市白领靠个人努力打拼成就自己的事业，他们中的部分人希望孩子也能“复制”自己的成功道路，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父母的焦虑。他提醒家长，既不要苛求孩子一定走和父母相同的路，也不要完全否认自己的道路，今后的选择是多元的，任何一条发展道路都未尝不可。

有专家提及，如今的“85后”、“90后”家长们对孩子的养育观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们更注重孩子的基本生活习惯和情感品格。此外，这些年轻家长更关注孩子的眼界、对于事物的判断力以及感悟力。“如果孩子想洗碗，家长就该让孩子体验。教育不应该有边界，应该让孩子接触家里的花草草、感受风霜雨雪，这是生活的核心。”

任友群透露，女儿10岁时，为了锻炼她独自生活的能力，他曾经鼓励女儿独自一人到亚马孙热带雨林参加青少年科技活动。在当地与各种小动物接触的过程中，女儿没有丝毫恐惧感，对生物充满兴趣。“成人可以提供丰富的环境，鼓励孩子自己接触，引领感受多样的文化、艺术，从而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

“每个孩子各有天赋，成人不单是要灌输知识，更要在孩子小时候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把他们的天赋发挥出来。”葛剑雄说。

那些20岁前崭露头角的“音乐天才”为何30岁后大多销声匿迹？

■本报记者 朱颖婕

很多人或许注意过这个现象：在中国，20岁以下的“少年音乐天才”层出不穷，但很多人在30岁以后便销声匿迹，而国外的情况刚好相反。而且，近年来我国的音乐表演人才在国际上获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张巍教授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岁之前往往是一个人完成技能学习和训练的阶段，这种“优秀”是在“师傅带徒弟”模式中练出来的。但对一位音乐家来说，仅仅做到技艺精湛是不够的，唤起美感永远是艺术的根本。20岁之后，音乐家需要真正沉淀下来，学习和感悟艺术。尽管“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有其优势，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未来的高级表演人才一定是综合式的。

考虑到世界音乐的发展态势和城市文化发展的需求，拓宽高水平表演人才的培养路径势在必行。张巍透露，音乐表演专业只设硕士学位，曾是制约我国高水平表演人才发展的“天花板”。近日，上海音乐学院宣布开展表演专业博士（DMA）学位点建设，今年3月将进行首次招生。“未来的高水平表演人才一定是综合式的，他们需要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社会文化服务能力，音乐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也应随之改变。”

高水平表演人才的培养需求日益增长

针对高水平表演人才的培养，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各种探索。张巍介绍，在美国，音乐艺术博士学位（DMA）的设置是为培养具有一定独立学术功底、研究能力的音乐演奏家和高校教师提供了更多平台；而在欧洲，音乐艺术博士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为学术研究型（PhD），第二类为职业专家型，演奏家可以在硕士毕业后考取高级演奏家文凭。但在我国的学位体系中，音乐表演专业只设硕士学位。

为了突破瓶颈，经过多方论证，不久前，上音决定以现有学位体系为基础，率先确立廖昌永教授领衔的声乐（美声）表演艺术研究和俞丽拿教授领衔的弦乐（小提琴）表演艺术研究，开展表演专业博士建设工作。张巍表示，这两个方向

本就是学校的传统强势学科方向，教师队伍带头人也是业内的领军人物，而且小提琴是古典音乐中的重要乐器，也是一个知识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而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声乐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同时它还拥有巨大的未知研究空间。此外，学校近日与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大学签订协议，“1+1”联合培养高级演奏家，相当于行业内的博士学位。

这两条借鉴自欧美音乐教育的培养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补。可以想见，未来的高水平表演人才，除了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还能在专业发展上更进一步，提升理论研究能力、社会文化普及和服务能力。

在张巍看来，音乐表演人才的博士教育既符合人才自身发展的需求，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位演奏家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后，必然迫切地需要知识的更新。而学位的提升，也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平等的国际对话，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音乐人才培养观需要转变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探索，折射出人才培养观的变化。张巍提到，长期以来，中国音乐表演人才的培养有一个特点：“均值很高，方差很小。”也就是说，人才培养口径相对比较窄小，而这很大程度上和人才培养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普遍认为能够独奏的就是高水平人才，不能独奏的，退而求其次去伴奏，再不济就去演奏室内乐。”但事实上，人才应该是不同类型的，而不同类型的更需要不同的培养模式。未来，我们更需要培养的是多样化的人才，而音乐教育应尽可能通过优势学科，培养那些以往关注不到的领域，比如说歌剧、古乐器等。

世界发展至今，人们经历了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眼下又站在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十字路口。而教育对象正是在这些深刻变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此教育模式和观念也要随之变化。在张巍看来，大学不仅承担着传承人类历史文化、创新知识的任务，它还要思考如何将知识作用于服务社会和大众。“在艺术演出越来越多、观众越来越专业的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培养领军音乐人才，为社会大众带去更多新的口味。”

